

การสรุปแนวคิดกลยุทธ์การเขียนบทสนทนาใน สีอ-ฟู

A Brief Thinking about the Writing Strategy of Ci-Fu Dialog Style

略谈辞赋对问模式之书写策略

ลี ซองปอ¹

บทคัดย่อ

โดยทั่วไปแนวการสร้างสรรค์งานเขียนบทสนทนาแบบสีอ-ฟู มักใช้วิธีการเล่า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มีชื่อเสียงจาก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ในนิทาน อันเป็นลักษณะ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ที่ปรากฏป้อยครั้งใน จวงจื้อ ซึ่งอาจ เสวยเฉิง ได้เคยกล่าวว่า “เป็นการสมมติการ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และนำความมาเปรียบเทียบกับแนวคิด ดังที่ใช้กันใน จวงจื้อ และ เลี่ยจื้อ” ซึ่งทั้งสองมีความเกี่ยวโยงกัน บทความฉบับนี้จะยกເອາດວ່າอย่างจากซึ่งอົ່ວົງກັບຂັ້ນຟູ ແລະນຳໄປເປີຍບັນຈວງຈື່ອ ເພື່ອດູກລຸ່ມທີ່ໃນການເຂົ້າ
ບັນຫາແບບສື່ອ-ຟູ ซົ່ງຈະສາມາດເຫັນກາຍເກົ່າຄໍາລ່າວ แนวคิดຂອງຄົນໃນດີຕາມເພື່ອເປັນ
ຂໍ້ສຽງໃນການໃຫ້ແນວຄົດຂອງຕົນ

คำสำคัญ: สีอ-ฟู; บทสนทนา; จวงจื้อ; การเล่าเรื่องจากเรื่องราวในนิทาน; กลยุทธ์การเขียน

¹ ลี ซองปอ สาขาวรรณคดีโบราณ คณะภาษาจีน มหาวิทยาลัยหนานjing สาธารณรั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ีน

LEE CHONG POR,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,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 Jing University P.R. China

李章博，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

ปีที่ 8 ฉบับที่ 2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8

Abstract

Generally speaking, the dialog style is a common style in Ci-Fu creation. Fables were used well and frequently, in addition, most of them were conversations in the work *Zhuangzi*. Like the author Zhang Xuecheng pointed out, there is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m. Consequently, the writing strategy of Ci-Fu dialog form is going to be inspected through a contrast reading among Song Yu Fu, Han Fu and fables of *Zhuangzi* in this paper.

Key words: Ci-Fu ; dialog style ; *Zhuangzi*; fable ; writing strategy

摘要

辞赋创作，常见假托人物以问对的形式。《庄子》一书，善用寓言以说理，且多采人物对问方式。如章学诚《校讎通义·汉志诗赋》所指出：“假设问对，《庄》《列》寓言之遗也”，二者具渊源关系。本文即以宋玉赋和汉赋为例，藉由与《庄》书寓言的对照阅读，来考察辞赋对问模式的书写策略，从中可发现它具有假借人物以代言、观点的推而进之、以所同而胜人之技法等特点。

关键词：辞赋；对问；《庄子》；寓言；书写策略

章学诚《校讎通义·汉志诗赋》曾谓：“古之赋家者流，原本《诗》《骚》，出入战国诸子。假设问对，《庄》《列》寓言之遗也；恢廓声势，

苏张纵横之体也；排比谐隐，韩非《储说》之属也；征材聚事，《吕览》类辑之义也。”¹其乃以溯源视角，推论辞赋叙写体式之由来。《庄子》一书，“寓言十九”²；检《庄》书，确实“大抵率寓言”³，而其寓言多採人物对问的方式。对于辞赋“假设问对”的形式，我们确可发现其遗留着《庄子》“寓言”手法的一些痕迹。今试从《庄子》寓言之问对，与辞赋设论对问的写作模式——以宋玉赋和汉赋为例——的对照阅读，以见辞赋此模式的书写策略、技巧或意义。

一、“更高观点”之代言人

庄子论道，喜“以寓言为广”、“以重言为真”⁴。所谓“寓言”，《庄子》自己的解释是“藉外论之”⁵，用郭象的说法即是“寄之他人”⁶；“重言”则是借重具权威性先哲的言说，故“‘重言’实为‘寓言’的一个次范畴”⁷。要之，庄子善于运用假托于人物的“寓言”方法申论其论点。因此，寓言中的人物便成为其道论的代言人。

除了为世所敬重的历史人物外，《庄子》书中的寓言人物多是虚构的，且其中一些命名蕴涵哲学性寓意，例如：天根、无名人、无足、知和、支离疏、啮缺、王倪等等。以命名来寓意，常常即是表达了作者思想观点之所

¹ (清)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(附《校讎通义》)，第98页，上海：上海书店，1988。

² 《庄子·寓言》。见陈鼓应：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，第774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0。

³ 《史记·卷六十三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，第2143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3。

⁴ 《庄子·天下》。见陈鼓应：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，第939页。

⁵ 《庄子·寓言》。同上，第775页。

⁶ 同上。

⁷ 林顺夫：《〈庄子·内篇〉里的孔子》，收入氏著《透过梦之窗口：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艺理论论丛》，第7页，新竹：清大出版社，2009。

ปีที่ 8 ฉบับที่ 2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8

在，而该类人物的问对内容，也即是作者所持观念和立场之展示。此点，在辞赋中也可见。如傅毅《七激》“徒华公子”、“玄通子”，张衡《二京赋》“凭虚公子”、“安处先生”等的命名，读者即可由此意会孰是赋家观点的叙述者。

设定了人物角色，便可藉由人物之间的问答或对话，对相关看法开展议论。所谓更高或最高观点，可于问对交流的思想激荡中，得以抉发、解释；且通过这样的互动过程，论点可被凸显，或更具说服力（正和封闭式一言垄断系统不同）。此即假设问对手法的意义。问对的形成，至少得有两个人物或两方的互动；即使是自论式的“自我对话”，仍会是有“另一个我”的声音，如扬雄《逐贫赋》设扬子与“贫”者，即内心自我分化的两种声音。故“二人”是问对的基本型态。甚至说，三人或多人大交互方式的设计，常也可以视为是“二人”者的分化，例如由《七发》、《七激》的客主二人，至《七辩》客主八人的变化，即可见一斑。然无论是二人或多人，在他人的对衬下，有一方的视域是至理，其论见具有“更高观点”的地位，也是作者议论精神的归结处。

《庄子》多二人或物的对问，姑举一例。《至乐》篇假设庄子和空髑髅的对谈¹。庄子以“贪生失理”等五种原因问髑髅成此死形之故，显示的即是世俗恋生恶死的一般观点，殊不知所问者，“皆生人之累”。故髑髅立足于更高观点，对以“死之悦”，以消解世人乐生忧死的想法；并皱眉蹙额回应庄子“使司命复生子形”的无谓问题。这则寓言，髑髅即是“以道论之”，

¹ 陈鼓应：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，第488页。

扮演的即是传“道”者的角色。后来张衡即以此为题材，创作了《髑髅赋》¹，也是藉由髑髅对张平子之间，表述了“死为休息，生为役劳”、“与道逍遙”的论点。

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说：“荀况《礼》《智》，宋玉《风》《钓》，爰锡名号，与诗画境，六义附庸，蔚成大国。遂（当作述）客主以首引，极声貌以穷文。”²由《庄子》寓言之问对，到宋玉赋的“述客主以首引”，其间文体形式遗迹是很明显的，而此书写模式也成为后来赋体的基本特征之一。辞赋之设客主，意义亦在于寄议论于问对，其中一方的更高观点，也即作者为文之用意，或文本精神注射处。如《风赋》³，即通过宋玉对楚襄王的回答，提出“大王之雄风”和“庶人之雌风”具有差距的观点，以反驳“快哉此风，寡人所与庶人共者”的观点，而此中即是寓讽于颂：颂的是“大王之雄风”，讽的是王不知“庶人之雌风”，漠视民间苦难。总之，《庄子》与辞赋之间对手法，皆意在假托人物以为一更高观点代言。所不同的是，《庄》旨在说理，赋因体物写志，重“铺采摛文”⁴、“极声貌以穷文”，故多“色相”、“铺排”；然赋“以色相寄精神，以铺排藏议论”⁵，在表面形式中，所寄寓的论点渐而彰显。

¹ 费振刚等辑校：《全汉赋》，第472-473页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3。

² 范文澜：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134页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8。

³ 赵逵夫主编：《历代赋评注》（先秦卷），第358-362页，成都：巴蜀书社，2010。

⁴ 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。见范文澜：《文心雕龙注》，第134页。

⁵ 清刘熙载《艺概·赋概》。见袁津琥：《艺概注稿》，第474页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。

二、“推而进之”和“以所同而胜人”

《庄子·知北游》载知和无为谓、狂屈、黄帝四人的问对¹。对话内容以如何知“道”、孰为知“道”为命题；换言之，也即是何为不知“道”、孰为不知“道”的问题。知一问无为谓，无为谓的“不知答”，真非不知“道”。知二问狂屈，其“忘其所欲言”，“似”不知“道”，然却是近于知“道”。三问黄帝，黄帝答知曰：“予与若终不近也，以其知之也。”意即黄帝和知终才是那不知“道”者。知者即是不知者，此正与一般以知为知“道”者的认知相异其趣。由“无为谓真是也，狂屈似之，我（黄帝）与汝（知）终不近也”的论述过程，呈现的即一观点的推而进之。狂屈“以黄帝为知言”，所谓“知言”者，于此也即是“更高观点”的抉发者、总结者。

对问中论点推而进之的写作技巧，在辞赋创作中也可见。《钓赋》设宋玉与登徒子并见楚襄王言“善钓”之事²。登徒子认为善钓者是“以三寻之竿，八丝之纶，饵若蛆螬，钓（当作钩）如细针，以出三尺之鱼于数仞之水中”，这是第一种认识观点。宋玉另辟蹊径，就此议题进一步提出另一种新颖的创见（楚王以为迂说）：“所谓善钓者，其竿非竹，其纶非丝，其钩非针，其饵非螬”，真正的“钓道”，乃是“昔尧舜禹汤之钓也，以贤圣为竿，道德为纶，仁义为钩，禄利为饵，四海为池，万民为鱼”。宋玉是以圣王之道论钓之善，而由登徒子所说的“术”的层面，进乎此“道”之境界，乃形成一更高层次的论述话语；同时，可藉此论顺谏楚襄王当以圣人之钓为

¹ 陈鼓应：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，第 596-597 页。

² 赵逵夫主编：《历代赋评注》（先秦卷），第 402-405 页。

“大王之钓”，而不应以“水滨之役夫”自居。清人浦铣《复小斋赋话》即称：“宋玉《钓赋》，可为讽谏法，当以《庄子·说剑篇》参看。”¹

又如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赋²。此赋假托虚构性人物子虚、乌有先生、亡是公三人的对话来为议论铺叙。对于齐王的欲夸以车骑之众，楚使子虚应以楚泽云梦之事，而认为“齐殆不如”。此是第一种观点：“盛推云梦以为骄，奢言淫乐而显侈靡”，却“不称楚王之德厚”，故乌有先生以为不可取。然乌有先生又进而以齐地“吞若云梦者八九，其于甸中曾不蒂芥”之言为驳，复是显奢侈的说法。这是第二种观点，未尽抉“德厚”意，然已稍点到，实较第一种观点推进一层。至第三人，论点又更进一层，乃所藏最高观点的发抉。亡是公认为“二君（子虚、乌有）之论，不务明君臣之义，正诸侯之礼，徒事争于游戏之乐，苑囿之大，欲以奢侈相胜，荒淫相越”，终非正论。故先铺述天子上林之“巨丽”，以明齐楚之事何足道。至言天子校猎、游戏懈怠，话语渐而收敛于意旨之所在：

于是酒中乐酣，天子茫然而思，似若有亡，曰：“嗟乎，此大（太）奢侈！……恐后世靡丽，遂往而不返，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。”于是乎乃解酒罢猎……于是历吉日以齐（斋）戒……游于六艺之囿，驰骛乎仁义之涂……若此，故猎乃可喜也。若夫终日驰骋，劳神苦形，罢车马之用，抗士卒之精，费府库之财，而无德厚之恩。务在独乐，不顾众庶，忘国家之政，贪雉兔之获，则仁者不繇也。从此观之，齐楚之事，岂不哀哉！

¹ 何新文等：《历代赋话校证》（附《复小斋赋话》），第392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。

² 费振刚等辑校：《全汉赋》，第47-50, 62-68页。

亡是公的侈言壮丽，乃蓄意待发，仁义之行、德厚之恩，才是目注之处，故其立足点较乌有先生为高（子虚自不待言），也可以说是乌有先生观念的“完成”式。全赋推进论之，曲终奏雅，前之铺张，可谓即为抉藏。明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说：“其变幻之极，如沧溟开晦；绚烂之至，如霞锦照灼。然后徐而约之，使指有所在。若汗漫纵横，无首无尾，了不知结束之妙”¹，可以作为此赋法特点的一个注脚。

枚乘《七发》设楚太子有疾，吴客往问之一事²。吴客欲以“要言妙道”劝说太子以去其病。一曰“天下之至悲”，二曰“天下之至美”，三曰“天下之至骏”，四曰“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”，太子皆无动于衷，这些是不能引起太子兴致的观点。五曰“校猎之至壮”，可见太子“阳气见于眉宇之间”，渐露悦色，而吴客见状，“遂推而进之”；至此，乃欲以太子所爱好者说之，是进入使太子有起色的论说。故其六进曰“观涛”。然而，面对此“天下怪异诡观”，太子终究不能强起观之。于是，谈论又递进于“七曰”，并以此最后最高观点为归结：所谓“圣人辩士之言”，可修身养性，使心志不外驰，才是真正意义的“要言妙道”。于铺写中层层推进，以揭橥议论之旨趣，此即是对问体式的书写技巧之一。

设论问对，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表达方式。有的直接反驳或回应对方，有的则顺从对方的观点脉络，来提出超越对方论点的独特见解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³中惠施谓庄子曰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

¹ 陆洁栋等批注：《艺苑卮言》，第13页，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09。

² 费振刚等辑校：《全汉赋》，第16-21页。

³ 陈鼓应：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，第35页。

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，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”庄子的回复里用了鯤牛之大而不能执鼠（即“无用”意）的例子，以喻“大者不可责以小用”¹；又说：“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”此即依顺惠子“大而无用”的说法，而超拔其上的高明立论。又于《庄子·说剑》篇²，此手法的运用非常明显。

赵文王喜剑，门下剑客众多，太子悝请庄子“说王之意止剑士”。知赵王好剑，庄子即以其善剑术见王。先言其剑术“十步一人，千里不留行”之天下无敌，次言“为剑者，示之以虚，开之以利，后之以发，先之以至”，此皆肉眼可辨识的技术，也即是赵王所喜爱的剑事，故庄子这是悦王之意。顺此而推之，庄子于是提出更高层次的善剑之道，也即“三剑”说：“有天子之剑，有诸侯之剑，有庶人之剑”。由此“三剑”论述，遂乃劝服赵王慕其高上者，绝其鄙下者。刘熙说得好：

天下事物之情，莫不毁异而尊同，捐小而慕大，以至违害就利，往往皆然。若其不与己同，虽利不从；不见所利，虽大不慕。庄子论道，是篇及于辞人说客之言者，盖寓至理于微渺，必假言而后获也。物情自贵而相贱，自是而相非，而欲以不同期人之同，则虽夫子之圣亦屈于盗跖之暴矣。以所同而胜人，则庄子一言而绝赵王终身之好者，固其理也。³

¹ (清)陆树芝：《庄子雪》，第11页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1。

² 陈鼓应：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，第856-863页。按：苏轼等人多疑《说剑》篇乃后人所窜易。今姑不论其真伪，仍其旧。然无疑的，此篇具有辩论说之技艺。又，宋玉《钓赋》句法与此篇相似，二文明显具有沿袭的印迹。如《说剑》：“诸侯之剑，以知勇士为锋，以清廉士为锷，以贤良士为脊，以忠圣士为镡，以豪桀士为夹。”《钓赋》：“昔尧舜禹汤之钓也，以贤圣为竿，道德为纶，仁义为钩，禄利为饵，四海为池，万民为鱼。”

³ 引自陆树芝：《庄子雪》，第368页。

顺依对方所认同的观点以进行议论，这就是对话中“以所同而胜人”的方法。其作用微妙，是顺谏经常会使用的手段。故于辞赋问对的模式中，也可见此技法。

例如前文所述的《子虚》《上林》和《七发》。亡是公认为子虚、乌有先生的论见是“以奢侈相胜”，然自论己见时，仍先示以天子上林之靡丽，于此顺同的语境中，渐推进至奢侈终非正道，当以仁德之政为本的观点。吴客说楚太子，诊断其病根为“淹沈之乐，浩唐之心，遁佚之志”，惟所说的七事之中，却先欲以音声、食物、乘舆、景色等之美好动其心，当言及游猎，太子喜好之心微漾，又继而言观涛，此皆依着对方的立场来发言。末乃收束于要旨所在，更高观点得以胜出。此即是以所悦而说之、以所同而胜人。

三、结语

经由与《庄子》寓言的对看，可知辞赋问对形式的一些特点：一、假设人物以代言，不论二人、三人（二、三人为主要格式）或多人对话的设拟，其间一方的论述代表着一更高观点，且寄寓作者议论的精神。二、观点的表现方式，是推而进之的，故铺写之中即蓄藏着主意，就此意义来看，也可以说，铺张亦为抉藏。三、在议论技巧的层面上，或採取“以所同而胜人”的方法。

认识了问对模式的书写策略与技巧，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，自会注目于其所藏论点的出现。不过，辞赋叙写的铺张扬厉，也会淹没了其观点的表述，使得讽谏精神被忽略，以致于有“欲讽反劝”的现象。

參考文献

- (清) 章学诚: 《文史通义》(附《校讎通义》), 上海: 上海书店, 1988。
- (汉) 司马迁: 《史记》,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3。
- 费振刚等辑校: 《全汉赋》,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3。
- 赵逵夫主编: 《历代赋评注》(先秦卷), 成都: 巴蜀书社, 2010。
- 何新文等: 《历代赋话校证》(附《复小斋赋话》),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7。
- 范文澜: 《文心雕龙注》,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78。
- 袁津琥: 《艺概注稿》,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9。
- 陆洁栋等批注: 《艺苑卮言》,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09。
- 陈鼓应: 《庄子今注今译》,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0。
- (清) 陆树芝: 《庄子雪》,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。
- 林顺夫: 《透过梦之窗口: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艺理论论丛》, 新竹:
清大出版社, 2009。